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商丘

商丘文萃



刘万华
王红梅
张学勇◎主编

大象出版社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中原传媒股份公司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商丘

商丘文萃

刘万华
王红梅
张学勇◎主编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中原传媒股份公司



大象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商丘文萃 / 刘万华, 王红梅, 张学勇主编. — 郑州 :
大象出版社, 2018. 8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商丘)

ISBN 978-7-5347-9446-9

I. ①商… II. ①刘… ②王… ③张… III. ①文化史
—商丘 IV. ①K296. 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63393 号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商丘

商丘文萃

SHANGQIU WENCUI

刘万华 王红梅 张学勇 主编

出 版 人 王刘纯
责任编辑 赵晓静
责任校对 安德华 张迎娟
封面设计 烟 涛
版式设计 王莉娟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郑州市开元路 16 号 邮政编码 450044)

发行科 0371-63863551 总编室 0371-65597936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郑州新海岸电脑彩色制印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1.25

字 数 339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8.3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鼎尚街 15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67358093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商丘”系列丛书编委会

顾 问

王全周

总策划

曹月坤

编委会主任

栗朝举

首席文化顾问

李学勤

文化顾问（排名不分先后）

赵平安 赵世瑜 朱绍侯 乔 健 夏挽群 李玉洁 范国强 冯克坚 高有鹏 王树林
刘太品 刘海旺 李可亭

编委会副主任

史新艳 陈东程 班奎星 高 进 张卫东

编委会成员（排名不分先后）

万济江 马文卿 马学庆 马媛媛 王少华 王红梅 王红霞 王良田 王增文 卢明庆
冯继强 刘万华 刘春正 刘昭允 刘秀琴 刘秀森 任少华 任秀燕 许 华 孙付斗
朱凤祥 朱洪涛 朱长征 李传杰 李广瑞 张学勇 张淞清 张新根 杨道彬 余福海
陈功文 陈登华 杭冬青 尚起兴 尚 骥 赵云峰 侯公涛 侯 博 胡青松 洪文学
贾 光 贾长城 唐文君 曹珂铭 梁晓晨 崔闫芳 崔 征 董志华 蒋友亮 谢君善
潘海鹰

总主编

高 进 张卫东

执行总主编

张学勇

副总主编

潘海鹰 唐文君

校 稿

王 倩 王宇鸿 刘素兰 刘俊侠 申银利 许 如 许 慧 闫浩博 孙 鑫 李先梅
李敏才 张语晴 沈其丽 宋 斌 陈 博 郭 慧 祝天惠 盛 鹏 崔闫芳 韩宪臣

摄 影

刘正义 张新根 张 民 刘小林 崔申义 张学勇 傅 青 魏文慧 吴士伟 张建起
卢明庆 李建立 沈艳霞 闫松林 张冬至 张道军 马学庆 谢君善 吴超群

封面篆刻

张永乐 李 林 宋玉磊 范乾虎

绘画插图

高喜军 曹天舒 孟新宇 王圣松 杨 波 李晓伟 王保成 王根成 雷 玖 孙志杰

书 法

张永乐 李 林 贾长城 柴天麟

排 版

烟涛书坊

总 序

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组织编撰了一套“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商丘”系列丛书，我觉得这实在是一件好事。

之前商丘几届领导都曾打算组织对商丘历史比较熟悉的专家和学者编撰出版这样一套丛书，如今终于如愿！

这套丛书共计 25 种（26 册），我未能通读，对书的质量无法做出准确评价。但无论如何，这套丛书的出版，在商丘是一个可喜的突破，对当地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是有实际意义的。

记得 2004 年 5 月，商丘市政府和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共同举办“中国·商丘与商业起源研讨会”，邀我参加，但当时我因故未能成行，只向研讨会发了个贺电，实在遗憾。一个月后，我去商丘考察，先去了芒砀山，看了那里的汉墓群，看了那里的馆藏文物，又在当地领导的指引下到商丘博物馆参观。那么多有研究价值的文物，让人不能不对商丘灿烂悠久的历史表示赞叹，我在留言簿上欣然写下了“焕彩流光”四个字。那次在商丘，我还看了“中国·商丘与商业起源研讨会”的材料，感觉会议开得非常成功，就学术界怎样对国家建设做贡献迈出了很好的一步。会议之所以成功，缘于商丘有着深厚的历史文

化底蕴，缘于商丘领导一贯重视文化资源的开发。现在看来，学术界对商业起源于商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明显的阶段性成果，应该给予充分的认可。

《诗经·商颂·玄鸟》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商丘是商文化发源地，这应该是有问题的。我想，等将来条件允许了，考古学界、历史学界的专家学者可以在这方面做更深入的探讨。商业是从商人祖先起源的。当时我在商丘也题了几个字：“商人商业源于商丘。”想追寻华商的“根”，便一定要追溯到王亥。

近些年，不少学者提出“中原文化”这一概念。这不是要恢复中原中心论，而是说明在历史的若干关键性当口，特定的地区会起特殊的作用。商丘地处中原，帝喾都亳，在商丘；汤居亳，与葛为邻。《汉书·地理志》记载：“周封微子于宋，今之睢阳是也，本陶唐氏火正阍伯之墟也。”商丘一带又是道家主要代表人物庄子 and 名家代表人物惠施的故乡，也是儒家创始人孔子的祖籍地；有的史书记载说墨子也是宋国人，还做过宋大夫。商丘历史文化底蕴丰厚，特别是儒学，与商文化有着浓厚的渊源。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儒学是主流，而经学又是儒学的核心。不研究经学，不了解经学，应该说就不能把握住我们传统文化的主流和核心部分。今天不少学者说，经过研究，儒家的经，不仅对于今天，对于未来的中国，甚至对于全世界的文化都可能有所贡献。经是什么？当然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这些都不是在孔子那个时候才开始的，而是在孔子那个时代已经有了崇高的地位，不管它们是不是叫经。在《左传》《国语》里面，当时的贵族都是在讲《诗》《书》《礼》《乐》的一些问题，将其作为经典来引用。《诗》《书》《礼》《乐》等都是经典，孔子“述而不作”，删定“六经”，是做经学的工作。墨子也讲三代，讲先王，因为这属于传统文化，是他们都回避不了的。1956年，信阳长台关出土了一批竹简，我看到竹简上有三代、先王等概念，认为它一定是儒家的作品，可是后来被证明是墨家的。

这个问题很值得检讨。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儒家与墨家有一个共同的文化源头，受到相同的教育，所以他们会使用相同的概念，有相近的主张。这些都属于经学，尽管当时还没有经学这个名称。经学研究是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重要研究问题，儒学和商文化渊源很深，希望商丘学者能在这方面的研究上做出贡献。

编撰“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商丘”系列丛书，说明当地政府对商丘这一地域的历史文化是很重视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以后可能会不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果，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做出更大贡献。

李學勤

二〇一七年十月廿六日

（李学勤系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中国文字博物馆馆长，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

论商丘地域传统文化精神（代序）

商丘是 1986 年被国务院命名的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她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文化资源丰富，从传说时代的商丘火文化和原始部落时期的商祖文化，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墨子文化、庄子文化，汉代的梁国文化，隋唐时期的木兰文化，宋代的应天书院文化，明末清初的雪苑诗社文化等，形成了很长的文化链条。为了更好地传承商丘历史文化的优良传统，建设美好未来，本文谨对商丘地域的传统文化精神略加论列，请方家正之。

一、善于发明创造的创新精神

相传商丘是人工取火的发源地。《韩非子·五蠹》云：“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人工取火的发明结束了人类茹毛饮血的时代，开创了人类文明的新纪元。

而人工取火的发明者燧人氏，死后葬在商丘。清乾隆十九年本《归德府志》卷三十三《古迹略下》记载：“燧皇陵在阌伯台西北，相传为燧人氏葬处。”现存于商丘古城西南 1.5 千米处的名胜古迹燧皇陵，就向人们昭示了人工取火的发明与商丘先民的密切关系。

商丘也是中国商业文明的发源地。《世本·作篇》记载：“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周易·系辞下》：“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中这样写道：“传说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就是驯养牛马，作为运载的工具……在各部落之间进行贸易。”相土是商部族始祖契的孙子，王亥则是契的第六代孙。据文献记载，最早的商品贸易活动就是从他们开始的，王亥更被后人称为商业始祖。

商丘还是我国最早的歌舞之乡。上古“三皇”时，商丘市宁陵县一带叫“葛”，葛天氏部族在此休养生息，创造了以“葛天氏之乐”为代表的早期人类文明。关于“葛天氏之乐”，《竹书纪年》《吕氏春秋》《事物纪原》《群书考索》《文献通考》《史记》《路史》等文献都有记载。《吕氏春秋·古乐篇》云：“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葛天氏之乐”是我国有文献记载的第一支音乐歌舞，它是我国音乐、舞蹈、诗歌、剧目的重要源头；而葛天氏则是我国音乐、歌舞的始祖，商丘市宁陵县则是中国最早的音乐、歌舞之乡。

另外，仓颉造字、杜康造酒、伊尹发明中药煎服和烹饪技术，也都与商丘相关。

仓颉，相传为黄帝的史官，汉字的创造者。《世本·作篇》载：“沮诵、仓颉作书。”许慎《说文解字·叙》也称：“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远之迹，知分理之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义，万品以察，盖取诸。”《荀子·解蔽》《韩非子·五蠹》《淮南子·本经训》《吕氏春秋·审分览·君守》等古代典籍里也都有关于仓颉造字的记载。仓颉墓位于今商丘市虞城县西北 18 千米处的

垌堆坡村西，今仓颉小学处。

商丘还是杜康发明酒的地方。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记载“杜康作秫酒”，说明杜康是酿酒的始祖。据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记载，杜康是夏王相的儿子，因遭寒浞追捕，逃到今商丘市虞城县依附有虞氏当了“庖正”。据传，一天，杜康把没有吃完的饭存在桑树洞里，几日之后，经过自然发酵，酿出了气味芬芳的美酒。曹操《短歌行》：“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遂使杜康美酒名扬天下。

伊尹为商朝成汤的宰相，辅佐成汤灭了夏桀，建立了商王朝。他还是厨师之祖，有“烹调之圣”的美称，“伊尹汤液”为人传颂千年不衰。相传伊尹发明了中药煎服和烹饪技术。伊尹死后葬于商丘，其墓位于虞城县西南 20 千米的魏垌堆村。

商丘人李书伟在《商丘赋》中写道：“华夏文明，此多发祥。燧人钻木，迸出人间第一火，作别茹毛饮血，人类文明始迈步；王亥驯牛，初创牛车第一乘，始得以物易物，世间商人由此生。伏羲始祖，狩猎睢水造弓箭；炎帝先宗，躬身此处兴农耕。伊尹创药汤，佑尽天下生命；仓颉造文字，遂作万世文宗。孔子祖籍，半部《论语》治天下，儒道兹始；老庄故里，一篇《逍遥》诵千秋，道教遂生。葛天一曲，五洲始有乐声起；杜康三杯，四海初闻黍酒香。”这一切，都表现了商丘人善于发明创造的创新精神，而这种创新精神也正是商丘人生生不息的力量之源。

二、关注民生、抵御外侮的爱国精神

墨子主张“兼爱”“非攻”，隋末魏木兰（花木兰）代父从军，唐代张巡、许远守卫睢阳城，是这种文化精神的卓越代表。

墨子是战国初期著名思想家，墨家学说的创始人。墨子究竟是哪里人，历来说法不一，至今仍有宋国人、鲁国人、鲁阳人、印度人四种说法。详考有关史料，我们认为，鲁国人、鲁阳人、印度人三说皆不可靠，墨子实际上是宋国人，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商丘市一带人。笔者曾在《墨子宋人考辨——兼驳墨子为鲁国人、鲁阳人、印度人三说》一文中有专题论述，此文发表在《史学月刊》1996年第5期。墨子学说的主要内容是“兼爱”和“非攻”，而“兼爱”更是他的学说的核心。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下》），“爱人若爱其身”（《墨子·兼爱上》）。孟子说：“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墨子的“兼爱”思想，是企图把小生产者互爱互利的德性扩大到全社会，典型地反映了他关注民生、以天下是非兴亡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道义感。墨子还提倡“非攻”，在当时诸侯国互相攻伐兼并的情况下，他坚决反对侵略战争。《墨子·公输篇》记载了他止楚攻宋的故事。他当时旅居在齐国（一说鲁国），听说楚国准备攻打宋国，他一面安排弟子禽滑厘等300人，持守圉之器帮助宋国守城，一面“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亲自出马去劝阻楚王发兵，表现了他与宋国的血肉联系和抵御外侮的伟大爱国精神。墨家的兼爱精神、爱国精神都值得我们今天认真地传承。

千百年来，《木兰诗》中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是，关于《木兰诗》的产生时代、本事和作者，至今仍是一个尚未解决的学术难题。笔者曾在《〈木兰诗〉的产生时代、本事和作者考辨》一文中指出：“《木兰诗》产生于隋末唐初，《木兰诗》的本事当与诸多方志书中所记载的隋代营廓镇（今木兰镇）魏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有关，《木兰诗》的第一作者当是魏木兰本人。”（见《河南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第3期）今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木兰镇有木兰祠，又称孝烈将军庙，始建于唐代，现存有元代侯有造“孝烈将军祠像辨正记”石碑，立于元代元统二年（1334）。其碑文云：“将军魏氏，本处子，名木兰，毫之谯人也。世传可汗募兵，孝烈痛父毫羸，

弟妹皆稚呆，慨然代行，服甲冑，鞬囊操戈，跃马驰，神攻苦钝，铤戎阵，胆气不少衰，人莫窥非男也。历年一纪，交锋十有八战，策勋十二转，朝觐天子，喜其功勇，授以尚书隆宠，不赴。恳奏省视。拥兵还雒，造父室，释戎装，复闺装，举皆惊骇。咸谓自有生民以来，盖未见也。卫兵振旅还，以异事闻于朝。召复赴阙，欲纳宫中，将军曰：‘臣无嫫君礼制。’以死誓拒之。势力加迫，遂自尽。所以追赠有孝烈之谥也。”又云：“睢阳境南东距八十里曰营廓，即古亳方域，孝烈之故墟也，亦建祠像，土人亦以四月八日致祭，乃将军生朝，沿习古老之云也。”另外，《大清一统志》《河南通志》《商丘县志》等方志书中也均有相同的记载。《河南通志》卷六十七云：“隋木兰，宋州人，姓魏氏。恭帝时发兵御戎，木兰有智勇，代父出征，有功而还。朝廷知其为女子，欲纳入宫，木兰不敢从，遂自尽。唐封为孝烈将军，乡人为之立庙。”“孝烈将军祠像辨正记”石碑和诸多方志书的记载，都是木兰为商丘市虞城人的历史见证。木兰这位抗敌御侮的巾帼英雄，正是商丘历史文化中爱国精神的最典型的体现。

今商丘古城南门外有张巡祠，是为纪念唐代安史之乱中抵抗安史叛军、保卫睢阳城（今河南商丘市南）的著名英雄人物张巡、许远等人所建。唐代的睢阳地处通往江淮的交通要道。公元757年，安史叛军为了南下江淮，派大将尹子奇率兵13万夺取睢阳。睢阳太守许远求助于雍丘（今河南杞县）真源令张巡。张巡立即带兵3000人进驻睢阳，与许远守军3800人合兵抗战。张巡善谋略，精兵法，此前已多次以少胜多，抗击了安史叛军。许远自知军事上不如张巡，战守事宜全由张巡指挥。张巡率众抵抗，日夜苦战，杀敌无数。有时一天多达数十战。张巡等坚守了10个月，大小战斗400多次，杀敌12万多人。其间，城中的战马、麻雀、老鼠、树皮、草根、纸、茶等能吃之物全被吃光，兵士仅余400人，终因饥饿、疲惫至极，无力再战，城池沦陷。张巡、许远及南霁云等将士被俘后骂敌不绝，英勇殉国。睢阳之战以少胜多，阻挡了安史叛军的南下，保全了江淮地区，为平定安史之乱立下了大功。张巡等将士精忠报国的英雄壮举，

在《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和韩愈《张中丞传后叙》等文献中多有记载，一千多年来一直被后人传颂。

三、安贫乐道、淡泊名利的旷达精神

庄子是商丘历史上著名的哲人，在他的身上就体现出一种安贫乐道、恬淡自适的旷达精神。

庄子首先是一位安贫乐道的人。他生逢乱世，“处穷闾阨巷，困窘织屦”（《庄子·列御寇》），靠打草鞋维持生计，有时接济不上，还曾“贷粟于监河侯”（《庄子·外物》）。他曾穿着破烂衣服去见梁惠王。梁惠王说：“何先生之惫也？”庄子说：“贫也，非惫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惫也；衣弊履穿，贫也，非惫也。此所谓非遭时也。”又说：“今处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惫，奚可得邪？”（《庄子·山木》）可见他生逢乱世，生活很困难，但他却安贫乐道，还保留着正直知识分子的完美人格。

庄子是一位很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但他淡泊名利，终生不愿出仕。《庄子·秋水》曾写到这样两件事。一件是庄子在濮水（今河南范县）边钓鱼，楚王使大夫二人前往礼聘，庄子“持竿不顾”，并声明自己愿意像神龟一样自由自在地“曳尾于涂中”。另一件是写惠施在梁国做相，庄子前往拜访，惠施听信别人的谗言，竟以为庄周前来是要取代自己，于是在国内搜捕庄子三天三夜。庄子很生气，直接面见惠施，称惠施的相位不过是鸱鸺口中的“腐鼠”，自己根本不屑一顾。《庄子·列御寇》还记载了宋人曹商为宋王使秦，秦王赏赐他车子百乘，他归来向庄子夸耀，庄子却斥骂他是“舐痔”得车。以上几件事都表明庄子不愿意做官，而且很讨厌那些热衷于当官的人。

庄子还是一位非常旷达洒脱的人。最高的旷达是参透生死。《庄子·至乐》载：“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夏秋冬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嗷嗷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庄子认为生死是一种自然现象，生和死的更替就好比是春夏秋冬的更替一样，所以不用悲伤。《庄子·列御寇》载：“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槨，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赇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乌鸢之食夫子也。’庄子曰：‘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庄子就是这样以亘古未有的幽默达观对待死亡，不以生喜，不以死悲，表现出无比豁达的胸襟。

庄子思想的最高境界是“逍遥”。庄子的《逍遥游》其实是一个思想者的人生宣言。逍遥是一种对自我精神的超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以一种超自然的态度对待生命中的种种磨难，以一种超自然的态度面对生活中的种种诱惑。

庄子的思想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庄子》以其汪洋恣肆、瑰丽多姿的文辞深深地吸引了历代文士，而庄子所提出来的人格理想，安贫乐道、淡泊名利、超然自适的旷达精神，更是深刻地构建了中国传统文人的内在精神世界，也成为商丘地域一种传统的文化精神。

四、文人相重、互相切磋、交流合作的团队精神

商丘地域历史上有过许多文人团队或者文化组织，例如战国时期的墨家学派、道家学派、名家学派，汉代的梁国文化团体，唐代的李白、杜甫、高适梁宋之游，宋代的应天书院，明末清初的雪苑社等。这些文人团队或者文化组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文人相重、互相切磋、交流合作的团队精神。

墨家学派既是一个学术团体，又是一个纪律严明的政治集团。据说墨家有180个门徒，为了实践墨家的主张，都能赴汤蹈火，虽死不辞，具有一种舍命行道的献身精神。《淮南子·泰族训》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化之所致也。”

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和以惠施为代表的名家学派，是战国时期同时活跃在商丘地域的两个学术文化团体。这两个团体不仅自身团结合作，互相切磋学术，而且两个团体之间也经常以辩驳问难的形式进行交流，庄子和惠施更是一生的对手和一世的朋友。我们在《庄子》一书中经常可以看到惠施的身影。庄子是哲人和语言大师，惠施也绝非庸才，《庄子·天下》言“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卒以善辩为名”。庄子与惠施都是论辩奇才，经常进行高水平的辩论，可谓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可惜天有不公，庄子的著作存世有洋洋洒洒的《庄子》一书，而惠施写在竹简上足足装满五车的著作却荡然无存。所以现在记载在《庄子》一书中的二人的辩论，常常是庄子占上风，惠施却成为庄子奚落的对象，如《庄子·秋水》写庄子嘲笑“惠子相梁”是“鸥得腐鼠”，《逍遥游》写庄子批评惠施“拙于用大”。但尽管如此，《庄子》书中所记载的二人的辩论，仍不愧为智者的论辩，仍然可以展现出二人各自非凡的气度与风采。例如《庄子·秋水》“濠梁之辩”一段：“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

‘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濠梁之辩”显示出庄子具有艺术家的风采，惠子则带有逻辑家的个性。庄子和惠施虽然在学术观念上相对立，经常辩论，但惠施又确实是庄子生平唯一的契友。这从《庄子·徐无鬼》“匠石运斤”一段中可以看出：“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顾谓从者曰：‘郢人堊慢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斫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斫之，尽堊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闻之，召匠石曰：‘尝试为寡人为之。’匠石曰：‘臣则尝能斫之。虽然，臣之质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惠施死后，庄子再也找不到可以对谈的人了。在这短短的寓言中，就流露出了庄子对惠施的那种纯厚真挚的友情。

汉代的梁园文化团体，主要是指围绕在梁孝王刘武身边的一批人，如枚乘、邹阳、庄忌、司马相如、路乔如、公孙诡、公孙乘、羊胜、韩安国等。他们与梁孝王君臣遇合，经常游乐于梁园之中，写辞作赋，互相唱和。《西京杂记》卷四记载：“梁孝王游于忘忧之馆，集诸游士，各使为赋。枚乘为《柳赋》，路乔如为《鹤赋》，公孙诡为《文鹿赋》，邹阳为《酒赋》，公孙乘为《月赋》，羊胜为《屏风赋》，韩安国作《几赋》不成，邹阳代作。邹阳、韩安国罚酒三升，赐枚乘、路乔如绢，人五匹。”从这段记载我们可以看出梁孝王对写作辞赋的奖励和提倡，更可以看出他们君臣遇合、文人相重、其乐融融的团队风貌。后代文人羡慕他们的优游岁月，于是形成了一种挥之不去的“梁园情结”。正是由于这种“梁园情结”，唐代的高适才不远千里来到商丘安居，李白、杜甫才有结伴梁宋之游。也许他们是受到了汉梁文化精神的感染，本来个个性格鲜明的诗人也一反“文人相轻”的恶习，互相爱重，一起登高怀古，饮酒赋诗，特别是李杜“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杜甫《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结下深厚的友谊，被后人传为千古佳话。